



西安交通大学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 《中国改革三步走》读书报告

学院： 软件学院

专业： 软件工程

班级： 7102

姓名： 徐 统

学号： 3117392003

## 《中国改革三步走》读书报告

郑永年教授写的《中国改革三步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改革步骤篇”和第二部分的“改革方法篇”，全书不仅通过纵向，即中国 2000 年以来的改革时间轴展开论述，同时也从横向，即与东亚与西方诸国进行对比，分析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问题，探讨中国改革的步骤与方法，全书的前半部分比较成体系，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这一部分也是让我最喜欢的部分，阅读过程中也是让我忧心忡忡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分析了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改革的处境以及改革的方向，看完这一部分我对改革是比较担忧的，所以我迫不及待的去看本书的第二部分改革方法篇，这一部分是以访谈录的形式叙述的，其中并没有太多的改革方法，我抱着对当前改革问题寻找解决途径的期望落空了。我对后半部分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中国的学习对象即新加坡的介绍和作者介绍的中国广东的“深圳模式”与“顺德模式”。

多年以来，众所周知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近 40 年，中国国力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所以一提到改革，人们想到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普通人也没有太多机会去理解中国的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作者在本书的前半部分将中国的改革分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加深了我对中国改革的理解，我曾经以为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是基本政治制度。”（胡锦涛同志《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但是读了本书我认识到经济改革只是中国改革的起点，而且经济改革难免会形成利益集团，后续的改革不可避免的触动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将会更加艰难。读完本书我大致有以下几点认识。

作者在描述经济改革的改革的时候谈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边界问题，这一点改变了我对国有企业的看法。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国有企业占比几乎 100%，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兴起了一轮“国企私有化”的热潮，这一时期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导致了一部分的国有资产流失，集体的资产流入了个人的口袋，也就是作者在书中写的“中国企业家的资本原罪”。我一度认为中国当今的贫富差距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累积起来的。我曾认为今天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几乎各 50%是不正常的，今天人们都羡慕或者抱怨国有企业的待遇福利优厚，上班时间固定，不用加班等等好处。我曾经觉得今天的国企的状况就是社会主义时应该有的样子，社会主义就应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像资本主义一样压榨劳动人们的血汗。所以，政府要做就是扩大公有制经济，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进入国企。可是，本书中作者却说国有企业漫无边界的扩张，挤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空间。我们的国企“大而不强”，依靠中央政策能够对民企形成碾压之势，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亏损的国有钢铁企业收购盈利的民营钢铁企业的例子。国有企业盲目走出去，到非洲国家投资，非洲国家政治不够稳定，可是在投资之前却没有风险评估。国企的领导有行政级别，而非专业的企业家，这些现状与我认同的精英

政治出入很大。我认为专业的人应该办专业的事。作者提出国有企业的领导去行政化，企业的领导首先要是一个企业家，也可以聘请专业的管理团队管理去管理国企，同时要“国退民进”，即国有企业要有明确的边界，国有企业只控制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方面，而把其他领域开放为民营企业，扩大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近年来的军工企业和民营企业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作者在谈社会改革时提到中国目前中产阶级的问题。中产阶级是指处于社会中等收入水平的阶级，处于社会中等收入水平的阶级，且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较好满足。按照《福布斯》杂志的定义，中国中产家庭，年收入应该在1万-6万美元之间。权威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说法，则是9000美元至3.4万美元之间。而国家统计局2005年则将年收入6-50万元之间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人群，即中产阶级。当前中国中产阶级数量还不够庞大，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为民主化确立社会制度，培育中产阶级。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到2020年我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7亿。如果中产阶级真能达到这样的规模，那么社会改革就会相对容易。但是，中国会不会进入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跳出这个陷阱的主要标志是培植一个庞大稳定的中产阶级。在很多方面，因为缺失中产阶级，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出现了类似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消费社会难以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缺乏基础。作者还谈到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建立“强政府”与“强社会”。作者认为第一个也是最重要层面

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的自我管理。作者认为社会改革是要加强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而不是通过政府类似“维稳”的暴力手段来达到社会的表面稳定。作者提到了“NGO 组织”，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NGO 组织”对我来说是一个新名词，我国当前的 NGO 组织也就是一些慈善基金会。他们服务能力有限，几乎不参与社会治理。第二个层面是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在一些政府必须参与的领域，可以委托给社会组织进行管理。政府一个钟形式向社会组织收购社会服务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大趋势。第三个层面才是政府管理的社会秩序。

作者在政治改革中谈到了政党的开放性和民主化的问题，主要是通过西方民主和新加坡的对比。在叙述政党的开放性时，西方总是批判我们的一党制，但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也是长期以来的执政党，却发展出了优质的民主。同时作者谈到了我们的“党内民主”。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那么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如上所说，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的。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的。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它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

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这样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如果说西方采用的是“外部多元化”，中国政党制度所体现的是“内部多元化”。各种利益先“内部化”，即容纳进现存体系，在体系之内争取利益和协调利益。在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之后，中共最近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这是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力量有了长足的成长和发展。而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关于民主化，作者认为民主化之前要建立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后才可能出现优质民主，民主的含义绝不是仅仅选举投票，只有经济改革带来了物质基础，社会改革扩大了中产阶级群体，建立了社会制度与法制制度，才会为政治改革中形成优质民主奠定基础。在这里，作者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投票不仅是一个公民的权利，同时也是一个公民的义务。”我认为今天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搞全民选举，很多人不能认真对待投票这件事情，人们投票选举不是抱着为国家民族负责的心态去投票，仅仅是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很多选民因为一点经济利益就出卖自己的选票。

作者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提到了“大部制改革”、“深圳模式”、“顺德模式”，作者提到在中国应该实现“县政”，即强化一线政府的作用，一线政府是政府与群众联系的纽带。作者在这一部分也详细介绍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培养党的干部的方式与中共很

不一样。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在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才干的，反而可能会被淘汰掉。因为主要从内部培养党的人才，基本上都是那些官僚型官员。官僚化严重也使得其培养的官员变成官僚，而非政治人物。同时，也是因为官僚化，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就不足。新加坡就不是这样，尽管它是一党独大，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是非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在 20 世纪 70 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又吸收了后来的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某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党龄”一说。这就解决了很多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在一些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作者在第二部分没有提出太多的解决方法，毕竟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说清楚的。

本书出版于 2011 年，6 年过后，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过去。今天回望过去五年，国家领导层面谈的最多的就是“简政放权”，鼓励非公有制经济，释放民营资本的活力；同时加强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民间企业发展。国家加大“反

腐倡廉”力度，清除了一批堕落腐化的党员，坚定政府工作人员的理想信念，进行初步的政治改革，“十九大”的党代表在人员性别构成与人员行业构成都更加合理，当选代表中一线党员占比 33.7%。

在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到：“2018 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 40 周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40 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生活实现了小康，逐步富裕起来了。我们将总结经验、乘势而上，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不移深化各方面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使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2019 年，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我们将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惠及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我们将继续落实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并对未来发展作出新的规划，推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2020 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我们将举全党全国之力，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确保兑现我们的承诺。我们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坚信，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2021 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



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我们要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习主席的讲话也透露出了进行经济、社会、政治领域改革的决心，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改革事业一定能够稳步实现；我也有理由相信“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017. 11. 6